

不彻底的体制改革或使中国走向少数人专制

吴敬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

从经济生活的表层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各地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环境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寻租腐败蔓延和贫富差距扩大。

从经济生活的深层结构看,主要是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过度膨胀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大偏离了正常状态。这样就造成了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

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这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本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自己的资源和环境。

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是:货币供应过量、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等等。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形势一度十分严峻。经过一年多来“扩需求,保增长”的巨大努力,虽然GDP增速回升,但是上述结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进一步追问原因,我们会发现,根源在于不彻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保持国有经济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这虽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但它们并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取代,而是逐渐固化为一种国家主

警惕中国经济进入「次萧条」阶段

刘元春

反弹的实质。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反弹、复苏。但上半年的反弹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超越萧条和复苏的阶段,快速进入经济高涨阶段,并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了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其核心原因在于,目前许多同比数据的高涨是基数效应、强劲的刺激政策、存货周期调整、世界经济短期同步反弹以及短期适应性调整等因素的产物,其增长的动力机制依然十分脆弱和敏感。

世界经济环境堪忧。2008~2009年为挽救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所进行的强力的救助政策,决定了世界将在过渡期中面临刺激政策退出的强劲冲击。这将给过渡期的经济稳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财政政策退出是最重要的影响。这种削减将对世界各经济体的复苏产生影响,特别是各国同步削减将带来更为强烈的叠加效应。世界银行测算,财政调整对增长的影响在3年内分别达到0.4%、0.9%和1.4%。金融层面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不仅老的问题,比如全球累计1.3万亿美元的损失还没有核销,而且新的主权债务危机又带来了新的冲击。

政策怎样应对?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为适应周期性的过渡期和结构调整的拐点期服务,而非绝对地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或物价水平的稳定。第一,在中国社会结构的约束下,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防止宏观经济出现总量性的失衡,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第二,应当在市场机制改革和创新体系改革上作文章,同时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以为市场自动寻找新增长点和产业方向打下基础。第三,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当看到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爆发性;要重视周期性力量与政策性力量的叠加、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叠加。第四,短期应当密切重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下滑,

导型的重商主义式体制。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履维艰,结构失衡难以解决,寻租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拉大,是这一体制的必然结果。

最令人忧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说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于是,向我们再次提出中国向何处去——是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的大问题。□

(来源:《新世纪》周刊 2010年7月5日)

防止由此带来的总量的失衡和动态的失衡。第五,未来的出口状况具有强烈的下滑趋势和强烈的不确定性,贸易政策的退出速度应当慎重。第六,消费刺激应当更多从一次性刺激转向中长期制度性调整。第七,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进行总量适度收缩的同时,应当保持总量宽松的原则。第八,中国虽然在中期面临着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政策应当作出以下调整:其一,通过社会体系的建设以加强低收入人群抵御通货膨胀冲击的能力,将货币政策从民生问题和生活问题中解放出来;其二,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度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而不是简单照搬过去和发达国家的目标值;其三,货币政策在适度总量收缩的同时,必须强调结构性的调控;其四,加息政策必须慎重。□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7月5日,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房地产不能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显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而同时,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因而,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除了表现在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综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

住房政策不只是经济政策

郑永年

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应该看到,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谐。近些年来,中国为解决住房问题出台了多项政策,例如“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但这只能是杯水车薪。很显然,就房地产而言,我们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面临风险;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中国人非常认同居者有其屋这一说法,年轻人普遍认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关。这两方面的后果都直接与社会和谐与稳定密切相关。

因此,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房地产业发展如何实现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需要我们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智慧。□

(来源:《光明日报》2010年7月11日,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